

■ 教育数字化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3.02.006

破茧而出：“部落时代”的教育危机及其因应



虞嘉琦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摘 要:“部落”并非指那些由若干血缘相近的氏族组合而成的群体,而是现代社会中因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聚集到一起的社群。前者是家族的衍生,后者是现代的产物。因此,也可称与传统血缘氏族不同的该兴趣社群为“新部落”。如果说脱离原有秩序的“游牧民”的产生是现代部落得以形成的前提,那么新兴媒介技术则为再部落化提供了技术性支持与可能性基础。借助新兴电子媒介的力量,强调个人与个人自由结社的“部落时代”正式来临。然而“部落时代”的基本症候却是人的“认知部落化”,即决定人们如何形成关于某一事件知识的判准,逐渐从个人的理性与事件的真相转变为个体的感性与群体的记忆。“讲理”与“求真”让位于“唯我”与“从众”。与体现现代性的科层制让个体效忠于因等级而壁垒分明的组织不同,反映后现代性的互联网令人服膺于因立场集结而成的部落。“因他者的丧失,而学习垂直化”“因为部落而战,而对话形式化”“因娇惯的心灵,而信息茧房化”是“部落时代”教育的三重危机。想要走出部落,强调建构真实对话空间的越境学习是关键。越境学习是通过对话更迭学习者经验的活动。从这一视角看,走出部落就意味着学习者借助与他者对话,而实现自身越境。越境服帖于他者,以最真诚的态度,呼唤他者对自我的回应。正视对话双方非对称关系的越境学习,不满足于基于尊重的共存,而是致力于基于对话的共生。为此,“你对此怎么看”须取代“事情就是这样”。

关键词:部落主义;他者丧失;越境学习;现代教育批判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3)02005212

当前,人们逐渐变得不可被说服。可以快速获得相关知识的互联网,给人一种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的错觉。一旦人们沉浸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幻想中,他将无意识地变得自负与自傲。他会首先树立一

修回日期:20220908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东西方文化互动视角下晚清粤港澳地区的启蒙教育研究”(GD21YJY07)

作者简介:虞嘉琦,男,浙江绍兴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研究。

引用格式:虞嘉琦.破茧而出:“部落时代”的教育危机及其因应[J].重庆高教研究,2023,11(2):5263.

Citation format:YU Jiaqi. Out of the cocoon: education crisis in the time of the tribe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3, 11(2):5263.

个被其身份所决定的“先入之见”,然后再从互联网上搜索能证实这“先入之见”为真的论据。至于那些与“先入之见”相悖的论据与观点,则会被论据搜索者自动无视。托马斯·尼克尔斯在《专家之死》中,将此视为使专家陷入社会性死亡的原因之一。一旦专家想运用专业知识击破那为大众所持有的“先入之见”,他将受到后者的猛烈抵触。在网络世界与日常生活中,大众常常只有争吵与谩骂,而没有对话与商榷。

这种作为主体的人有选择地对所属群体的忠诚与偏爱就是所谓的“部落主义”(tribalism)^[1]。在教育学界,“部落主义”常被当作“后真相”(post-truth)问题来处理。2017年,教育哲学家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s Peters)作为编者,在美国《教育哲学与理论》(*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杂志上介绍了题为“后真相世界的教育”(education in a post-truth world)的专题研究。在他看来,作为指称“客观事实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不如个人信仰与情感”这一状况的专有名词,与“事实”(facts)、“证据”(evidence)相关涉的“后真相”已经“成为各级教育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而为解决此类问题,有的学者借助“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ship)概念,希望通过开设批判性思维的相关课程,培养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学生,以应对形态多样的“假新闻”(fake news)^[3]。的确,在不看重证据与事实,强调身份与立场这一点上,“后真相”与“部落主义”相似。但后者不仅是前者的成因之一,更与人的存在方式相关联。在这个人部落式生存的“部落时代”,教育若不能回应时代的要求,其自身将陷入危机。

一、足茧手胝:“新部落”的含义与特征

人的认知受群体的显著影响,这是一个早已被心理学明证的事实^[4]。群体具有“整合力量”,居于其中的成员常常共有“各种传统、习俗与实践,传播的知识、信仰、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以及进行交流的语言形式、符号形式和共享的意义”^[5]。人被抛入群体中,分有群体的一切。这种群体包括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以地缘为基础的乡党、以业缘为基础的组织、以趣缘为基础的“部落”(tribes)等。在这里,部落并非指那些由若干血缘相近的氏族组合而成的群体,而是现代社会中因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聚集到一起的社群^[6]。前者是家族的衍生,后者是现代的产物。因此,也可称该兴趣社群为“新部落”(neo-tribes)。

(一)新部落形成的时代条件

部落的产生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人由为了某一命定的目标而不断奔赴的“朝圣者”(pilgrim)转变为自由选择目标并为之奔走的“游牧民”(nomads)^[7]。在缺乏流动性的古代社会,人生而“拥有”(have)被给予的神圣“人性”(human nature)。而在具有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人“存在”(be)于世间,自主选择各种世俗“身份”(identity)。他与生俱来的“天命”让位给了后天生成的“使命”,于是“使命”就不再反映群体的“天命所归”,转而体现个体的“生命价值”。

但对于生而群居的人类而言,这种巨大的变革也常常迫使人感受价值旁落的虚无、关系支离的割裂、崇高遗失的平庸。马歇尔·麦克卢汉发现了一种解决上述问题的新趋势,即基于新兴电子技术的“再部落化”(retribalization)。与发挥分割人体与社会力量的专门化的机械技术不同,非专门化的电子技术帮助人们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家庭”。这一新兴媒介技术的效果进而无时无刻不在规劝人们:“政治和历史都必须按照‘使五湖四海皆兄弟具体化’的形式来改造。”^[8]

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出了一个新部落形成的关键因素——媒介技术。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信息社会,人们在一个关系构建拥有无限可能的虚拟数字化空间,可以自主化、交互式、即时性地活动与生活。信息技术开启了主体通过电视、电脑屏幕和手机显示屏,营建外部和远处消失的多元化、景观式、具身性部落时空之路。如果说脱离原有秩序的“游牧民”的产生是现代部落得以形成的前提,那么新

兴媒介技术就为再部落化提供了技术性支持与可能性基础^①。“当代的部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人们不是被封闭在小圈子里面,而是处在一张四通八达的网络中,个体在网络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定位。”^[9]借助新兴电子媒介技术的力量,强调个人与个人自由集合的“部落时代”(the time of the tribes)正式来临。道德部落、政治部落、文化部落、消费部落等如雨后春笋般倍增。

(二)现代新部落的基本特征

现代“游牧民”以各种新兴电子媒介为平台,部落式地生活着。这种生活方式的变革为被印刷媒介符号所限制的大众“再次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提供了可能^[10]。学者们希望基于新媒介的新部落能加速并促成建立符号和意义联结的情感型消费^[11],更新并变革人际交往及世界互动的方式^[12],激发并提升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力^[13],释放并消除阻碍个体学习生活的负面情绪^[14]。难怪法国社会学家马费索利(Maffesoli)将当下喻称为“部落时代”。

在“部落时代”,人之行为反映出可以被命名为“部落主义”的新特性。该特性由以下 6 点构成^[15]。第一,“情感星云”(the affectual nebula)。人根据自身的情感需求与喜爱偏好聚集而成五花八门的部落。第二,“非定向结社”(the “undirected” being-together)。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定向结社,现代社会中的结社是非定向的。第三,“信教范型”(the “religious” model)。如果将部落比做宗教,那么部落中的成员就是教徒。教徒从宗教中获得情感的慰藉与在场的归属,宗教从教徒那里赢得组织的稳定与生命的赓续。第四,“选择性社交”(elective sociality)。所谓选择性即是指人主动选择社交对象,自主划定社交范围。第五,“保密法则”(the law of secrecy)。部落拥有法则,法则区隔内外。成员有义务保守部落的秘密。第六,“大众与生活方式”(masses and lifestyles)。人们基于自身的情感体验组合成当下相对稳定的具有吸引力与感召力的部落,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大众的基本生活方式。

根据以上马费索利的概括,部落的特征就可以首先表述为:情感性、选择性、易变性。情感性表明部落本质上是“情感部落”。具有感染力与爆发力的情感会如同星云一般,不断迅速扩大其“共情”范围。情感是人行为的出发点,也是部落形成的首因。不问性别、肤色、工作、阶层、民族、国家、文化,也不管内容、形式、内涵、项目、种类、活动,只要个体之间情投意合、同气相求、意气相许,他们就可以结成以“趣缘”与“情缘”为核心的部落。与其他成员合作时的快乐体验,不仅意味着一个持续的集体结构,而且还反映出成员对未来合作的期待与信任^[16]。正因为部落建立在个体情感体验的基础上,而情感又极其私人化,所以部落也就注定不普遍地属于所有人。选择性意味着个体只愿意跟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玩得好、处得来、谈得拢是人判断对方是否是其社交对象的准则。若没有具体境遇下的良好情感体验,人无法部落式地活动。而与情感性相关的易变性则说明部落会随着情感的变化而聚散。情感虽不像情绪那样稍纵即逝,但也不易保持稳定,故而部落绝不是一个不变的共同体。

“部落主义”是对不强调社群生活的“个人主义”、不提倡价值自足的“工具主义”、不重视感性力量的“理性主义”的纠偏。然而尽管部落被寄予了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厚望,但马费索利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他描绘的“部落主义”六大特征中潜藏着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密钥。部落的第四大特征,即危险性被低估。部落不单只是通过增加个人的感官刺激来拓展人之为人的生活向度^[17],也不仅仅满足于促进具有超现实、虚拟性、游戏性的“想象力消费”^[18],它更试图永久性地改造个体的存在方式与认知方式。

部落并没有像热忱迎接“部落时代”来临的理论家描绘的那样,让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兴趣而自由

① 在麦克卢汉看来,脱离原有稳定秩序的“游牧民”的产生即是印刷技术下的“去部落化”的结果,而人们再次因兴趣与情感结成部落、形成秩序,则体现出借助新兴电子媒介才得以可能的“再部落化”。从口语媒介下的“部落化”,到印刷媒介下的“去部落化”,再到电子媒介下的“再部落化”,这一部落的演变过程不仅反映出媒介技术对人的深远影响,而且也告诉人们:若没有“去部落化”后的个体的解放与现代电子媒介技术的发明,形成“再部落化”所指的“部落”绝无可能。

出入。它一旦形成,就如同一个“有机体”,有了自我存续的本能^①。这一本能的外在表现就是“认知部落化”,即决定人们如何形成关于某一事件知识的判准,逐渐从个人的理性与事件的真相转变为个体的感性与群体的记忆。在部落自我保存本能的影响下,理性与事实都失语了。一方面,理性并没有发挥其自我检视功能,而是充当感性的打手,批驳反对之声,搜集支持之语;另一方面,事实也无法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而是被部落的叙事涂抹,成为有罪之证,化为审判之据。对部落的归属感需求凌驾于科学事实之上,合理化机制将不悦耳的批评意见隔绝^[19]。因而与其说是外部人员因为了解了秘密而进入部落内部,不如说是早已知晓秘密但却因没有进入部落的机缘而尚未被纳入部落的隐性部落成员,终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转化成显性部落成员。部落是同质者的游戏,异质者的禁区。

二、作茧自缚:“部落时代”的教育群像

“部落时代”的降临,对教育的影响相当深远。它向教育提出了一个时代要求,即帮助学习者适应部落式生活。一方面,个人需要在教育的助益下,与同伴组成部落,以走出精神空虚与意义缺失;另一方面,个人又要在教育的助力下,防止“认知部落化”,以远离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与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然而以师生授受为核心的教育无法适应这种巨变,过于强调主体化的它至少遭遇了三重危机。

(一)因他者的丧失,而学习垂直化

在“认知部落化”的时代,现代社会看不见他者^②。人类让属人世界经由理性的改造,成为一个统一的科学世界。一切设想都基于科学的计量之上,一切选择都囿于科学的计较之内,一切未来都位于科学的计划之中。然而这种基于理性的必然王国却以理性对他者的本能侵犯为前提。认知本是人抵御僵化与封闭最为有效的手段,但“部落化”却事实上使其自我消解。在认知的运作下,事实与真相给予人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于是人从过往的安稳与闲适中被拽出,不得不面对迎面而来的认知失调。但“认知部落化”却永久取缔了认知失调。

不满于理性暴政的人想象出了另一条出路,即借助超理性的力量,打破理性的牢笼,回归人的本真状态。理性构建的统一幻想被超理性的跃动摧毁,理性招致的意义缺失被超理性的在场救治,理性伴随的人之废弃被超理性的力量阻断。个体在与理性世界的对抗中,感受到了作为主体的能动活力,体会到了作为生命的存在动力,察觉到了作为此在的决断魄力。但是“文化知识、习惯、传统、价值观,以及我们濡化而来的思想都有着巨大的力量,将会定义我们如何继续遇见、经历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20]。人们以为自己正在发挥主体的自主选择权,殊不知实际上他仅在复刻社群的文化迷因(meme)。随意自然的最终归宿是对当下现实态自我的纯然肯定。在我的世界之中,我诗意地栖居,无关他人,于是他者又丧失了。

因“部落时代”的到来而引发的他者丧失,又同步触发了一个教育危机,即学习垂直化。按照学

① 尽管所有组织都由人组成且由人运作,但如果因此就将组织看成是人的附属物,那就太低估组织的有机生长结构了。组织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有了自我扩张的欲望以阻止自身的消亡。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的扩张者与组织的建设者为组织设定的目标一致,但有时组织也会为了自身的保存而与其宗旨相悖。比如有些援助机构就难逃来自组织自身的诅咒。一方面,它的宗旨是通过帮助与赋能,使援助对象摆脱接受援助的状态;另一方面,援助机构自身的扩张,有赖于援助对象的增加。如果援助对象全都不再需要援助,那么援助组织也就完成了使命,可以解散了。若要援助机构蓬勃发展,那就需要更多能够引起公众关注的援助对象。作为组织的部落,有时也面临这样的困境。没有一个部落会坐视自己解散,为此它将持续输出刺激。

② 本文所用的“他者”泛指一切差异性存在,即“异在”。在不同的具体情景下,“他者”会拥有不同的内容。它被现代医学视为疾病的疯癫,被预警机制视为危机的风险,被纳粹分子视为祸首的犹太,被有神论者视为魔鬼的异端,被西方主义视为异域的东方,被殖民白人视为野蛮的黑人,被强势男性视为祸端的女性,被高种姓者视为不洁的贱民,被有产阶级视为敌人的无产阶级……正是因为“他者”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我们才经常无视他的存在,轻视他的特性,敌视他的异质,不敢正视他者对主体的冲击。

习者的经验状态来划分,学习大体上可以分为垂直学习与水平学习。垂直学习是学习者经验积累的学习,其结果为熟练程度与专业程度的提升;水平学习是学习者经验重组的学习,其结果是跨专业性与多向度性的增强^[21]。然而没有他者的部落却意味着学习者丧失了经验重组的契机。科学的理性与跃动的非理性都在鼓励学习者进行垂直学习,而与以培养专家为目标的垂直学习同等重要的水平学习却被排除在了学习的行列。学习被单向度地简化为垂直学习。于是作为有情主体的学习者,同化了他者^①。这一同化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几步。

第一步:学习者本能地持有消灭他者的恶意。他者的乍然现身意味着社群的区隔。我们倾向于偏爱内部成员而不是外部成员^[22]。“我们”是拥有相似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自己人,“他们”是与我们的存在方式不同的陌生人。自己人给人以熟悉感,陌生人给人以异样感。他者是潜在的敌人。“人在面对他者时所依赖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否定他者,围堵他者,羞辱他者,驱逐他者,甚至终结他者的生命。”^[23]本能的自恋与自卫驱使人们忽视猛然出现的他者与我们的相似性与关联性,而是选择“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一策略来尽力减少他者对自我的可能伤害。

第二步:学习者天然地拥有吸纳他者的先见。不得不与他者遭遇的人们并非毫无准备,而是天生便会使用极为强大的武器——先入之见。通过把未见之物纳入既有先入之见,把未遇之人接入现有认知网络,把未经之事联入原有经验体系,人的见解、知识、经验获得更新与迭代,他者向此在呈露与澄明。先入之见作为使人之理解得以可能的基础条件,既是人与他者相遇时人感知他者的起点,又是人与他者相争时人对抗他者的武器。但与哲学解释学认为先入之见不构成偏见不同,他者论视域下的先入之见,天然就对他者带有建构性敌意与社会性恶意^[24],因为他者的突然造访破坏了人好不容易建构好的属己世界的完整性与统一性。

第三步:学习者巧妙地将他者融于自传之中。在古希腊神话中,珀尔修斯(Perseus)借助雅典娜的盾牌映照出美杜莎(Medusa)之镜像,从而既机巧地规避了因目睹美杜莎而石化,又准确地探查出美杜莎的方位,并最终勇敢地斩下美杜莎的头颅。这个隐喻道出了自我杀死他者的全部秘密。自我无法正面直视被预设为危险的他者,他需逞奇炫异的计谋来出奇制胜。这一奇技便是“镜像”。他者的形象不能被当下直接地真实呈现,而只能借助我们的透镜才得以现身。由我们编织的关于他者的故事“为给定的‘我们’社群生成有意义的身份,把社会世界置于有故事情节的世界里,把社会价值注入人物、动作和情节。‘我们’和‘他们’的身份被人格化为主人公和对手”^[25]。在我们的故事中,作为主人公的“我们”无论经受多少困难,都将最终击败作为敌手的“他们”,正如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他们”的敌意早已被“我们”察觉,“他们”的模样只许被“我们”叙述,“他们”的命运预先被“我们”决定。“他们”的事实是什么不重要,“我们”的好恶是什么才重要^②。故事为“我们”肆意曲解、无端编造、最终降伏“他们”营建了一个无限宽广的想象空间。在那里,“我们”是“作者”,“他们”是“客体”。而“客体的现在可以在作者的过去里被发现。由此而言,事实本身作为科学思维的基石,是自

① 部落时代,“认知部落化”实际上就是他者同化,即任何异质之物都被收摄入自我现有的知识体系、价值秩序、存在之网。学习本应是借助理性与非理性的力量,实现与异质他者的公共对话,以此来突破信息茧房,戳破过滤气泡。但这一水平学习在部落时代却未被重点突出,且大有被垂直学习取代之势。学习的垂直化即是本应有两个维度的学习窄化为以经验积累、培养专家为目的的垂直学习。然而要想走出部落,阻断同化他者,以促进交流、培养公民为目的的水平学习更为关键。垂直学习未必同化他者,但拒绝水平学习的垂直学习却是他者同化。总之,认知部落化的实质是他者同化,而它加剧了学习的垂直化。人们愿意在他喜爱的领域钻研,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不愿意成为善于与异质者对话的公民。公共维度在部落时代的消减,这是笔者的担忧,也是教育的内在危机。

② 事实的本意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它意味着认识主体对对象的客观描述。但在“故事”中出现了另一种事实,即“另类事实”。人们不再通过详细的探查与认真的推理来了解事实,而是选择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来臆断事情的真相。不顾事实、信口开河、指鹿为马、以假乱真是“另类事实”的基本特点。为了利益,群体内部盛行起到保护部落群体安全的、对外部敌人说的“蓝色谎言”。互联网助长了“另类事实”的传播,而教育中的建构主义令学生怀疑知识的客观性。参见奥萨·维克福什著、汪思涵译的《另类事实:知识及其敌人》,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

传式的”^[26]。自传的倾向不但会消解他者的差异性与成长性,将他者同化到自我的认知体系之中,而且会强化自负,忽视自我内部的异质性与变动性。将“他们”放置于“过去”,于是“现在”的“我们”不但取得了高于“他们”的优越感,而且荣获掌握书写权的“作者”称号。他者被贬斥成客体,被放逐于过去,被污名为魔鬼。

第四步:学习者永久地习得同化他者的惯习。垂直学习不仅意味着自我对他者的收编与制伏,还表示这一防御与规避机制的惯习化。我们的认知在其自我异化中将他者故事化与戏剧化。他者不会在具体的情景下出现,而只能闪现在我们的自传里。中心位置在我,解释特权在我,判断标准还在我。唯我独尊的安全世界消灭了偶尔遭遇他者的现实世界。我们与他们的成长性都消失在了自我对他者的同化过程中。我很愉悦地成为自传世界的王者,堂而皇之地将他者消融。陷于自传世界的我们本能地害怕有破坏自我统一性的他者出现,而钝化了感知他者差异性的能力,常态化了针对他者的同化机制。于是所有学习都变得垂直,跃出自身边界的水平学习难以为继。

(二) 因为部落而战,而对话形式化

人的“认知部落化”直接招致了“他者丧失”。不过与体现现代性的科层制让个体效忠于因等级而壁垒分明的组织不同,反映后现代性的互联网令人服膺于因立场而集结而成的部落。互联网这一新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echo chamber)效应和过滤气泡效应使得部落之间沟通与对话的难度正逐步加大^[27]。大数据只推送赢得自我喜爱的消息,让自我可以建起与外界隔离的私密空间。异质者的否定性与差异性让位于同质者的肯定性与统一性。而一旦“认知部落化”成为部落内部成员的认知模式,那么他将始终“为部落而战”,捍卫部落的一切。

反映在教育中,“认知部落化”即时性地引发了另一个难解的危机,即对话的形式化。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与独断论式的自说自话不同的交往行为,须符合以下3个要件,即命题的真实性(wahrheit)、表达的正确性(richtigkeit)和主体的真诚性(wahrhaftigkeit)^[28]。这3项实际上是在要求交流双方言说真实的事件、遵循正确的规则和拿出诚挚的态度。

但在受“部落时代”影响的教育中,进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对话困难重重,因为它建立在与垂直学习迥异的水平学习之上。西川纯通过研究当前教育场景中的对话,指出了对话的形式化问题。学习者之间的对话状况可以分成3种:强制型、乡愿型、无关型^[29]。强制型是指对话者之间由于存在知识、身份、资源等因素上的显著不对等,而产生的弱势者无意识地接受强势者观点的现象。在知识权威面前,初学者不敢发出与权威解释不同的声音,这非常普遍。乡愿型是指对话者之间由于存在亲密的友谊,而产生的无原则地接纳亲密者观点的现象。爱屋及乌,于是对话者无条件地认为对方所言就是真理,对方所诉即是真相。这就使得处于亲密关系中的对话者,无法打破既有的认知框架,进行真正的对话。无关型是指由于存在对话者双方漠不关心的情况,而产生无可无不可的冷眼旁观现象。毫不相干的对话者既没有对话的热情,也没有对话的状态,而是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使得对话并没有起到交换意见的作用。

除了以上3种状态,逻辑上还应该存在第四种——敌对型,即由于对话者之间存在讨厌与嫉妒等负面情绪,而产生无缘由地拒绝厌恶者观点的现象。不喜情绪蒙蔽了对话者的心智,让对话陷入无解的僵局。

以上4种情况是教育场景中存在的对话走向,其从现实出发,点出了对话的困难性,而这些困难将使得理应包含结果向度的对话,最终却只停留在过程维度。而随之引发的误解是教育者将对话当成一种方法,而不去追究对话的结果如何。这就使得对话形式化。自此,在学习垂直化与对话形式化的双重轰击下,交流对象湮灭,潜在他者消解。人们看似自由地生活,诗意地栖居,实则自我地生存,封闭地蜗居。

(三) 因娇惯的心灵, 而信息茧房化

不以理服人, 而立场先行; 不言之有理, 而仗势欺人; 不就事论事, 而就人论事。其结果就是人在不知不觉中养育出了一个“娇惯的心灵”。格雷格·卢金诺夫与乔纳森·海特将这种心灵的表征概括如下^[30]:

1. 脆弱人设: 凡是伤害, 只会让你更脆弱。“认知部落化”让人易于承认自己的脆弱, 并进而减少与他者遭遇的机会, 然而差异的他者本是自我成长的契机。

2. 情感推理: 永远相信你的感觉。理性本来担负着通过接受多元的信息帮助个人走出“信息茧房”的使命, 但人们不再信任理性, 因为它总是鼓励我们费力地正面他者, 直视他者, 悦纳他者。“认知部落化”让人越来越相信直觉与感性的力量。

3. 我们对决他们: 生活是好人 and 恶人之间的战斗。与我认知相同的部落内成员善良, 与我认知相悖的部落外人员邪恶。于是严肃的事实讨论最终变成了判断谁是好人与谁是坏人的道德审查, 崇高的追寻真理无奈演变为“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的敌我斗争。

学习的垂直化与对话的形式化造就了娇惯的心灵, 而这即是教育的第三重危机——信息茧房化。“讲理”与“求真”让位于“唯我”与“从众”, 于是被人创造的部落变成了囚禁人自身的“茧房”。

在成员间共享一套伦理规范的道德部落中, 服务于群体利益的行为更有可能被判定为道德。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美国人支持特朗普做出的继续保持与沙特阿拉伯盟友关系决定的原因^[31]。群体内的利益塑造了道德判断。而当群体内的成员行为不道德时, 对群体声誉受损的担忧会使得人们对群体成员的道德失当行为采取消极的态度。他会为了防止部落名誉受损, 而不愿意公开揭发, 甚至愿意考虑极端的不道德行为, 比如伪造证据。对群体的责任感和声誉考量决定了人们是谴责还是保护群体内的违法者^[32]。

在成员间共享一套政治规则的政治部落中, 在新媒介的加持下, 因依附部落而造成的恶果有过之而无不及。“互联网为政治民粹主义提供了方便的新媒介, 互联网信息的‘自我引证’(self-referential) 和‘部落极化’(tribal polarization) 效应不仅对‘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 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 而且, 更为严重的是, 正在加剧一些社会中本来已经存在的分裂。”^[33]“自我引证”与“部落极化”让本应见多识广且通情达理的公民最终深闭固拒、固不可彻。

无论是道德部落还是政治部落, 这都意味着沉湎于部落的学习者, 难以成长为担负起公共生活的未来主体。于是他者的声音被进一步禁绝, 有效的对话被进一步遗弃。此时, 教育不但失去了助人突破与成长的教育性, 而且助长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最终成型。教育没有起到帮助学习者妥善地应对“认知部落化”危害的作用, 反而其中学习的垂直化与对话的形式化加剧了学习者的信息茧房化。无法适应“部落时代”的教育身处危机之中。

三、化茧成蝶: 离开“部落”的教育尝试

尽管我们承认“部落时代”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流体时代, 而不是一个否定迁徙的固体时代, 但人们期盼的可以依据个人喜好而自由进出的部落, 很可能只限定于某些兴趣爱好。在密度与浓稠度低的部落, 比如消费部落与兴趣部落, 成员确实有能力自由退出, 但在密度与浓稠度高的部落, 比如道德部落与政治部落, 成员往往难以主动脱离。马费索利之谬正在于其因陷于本质主义而怠慢了部落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了寓居于部落的个人能够感受到那丧失的他者, 克服“认知部落化”, 教育须通过越境学习来帮助学习者遭遇存在论上的中断。

(一) 主体中断: 对主权的侵犯

传统的教育强调将他者纳入自我统一性中, 而这无疑加剧了他者的丧失。仅依傍理性, 他者被禁

绝;依靠超理性,他者被清除。他者犹如美杜莎,她“代表一种如此根本的差异性,以至于人们看到她就会因之而死”^[34]。

人本应“将他者作为他者,将自己也作为他者,即作为有限的主体,将‘主体间性’推进为‘他者间性’,推进为本体性的‘文化间性’”,唯有如此“对话的效果”,即“对话者对自己的‘不断’超越,对自己的‘不断’否定,对自己的‘不断’重构”^[35]才能正常发挥。但现实是人将他者作为敌人,将自己作为上帝,即作为无限的主体,将“主体间性”限缩为“唯我独尊”,矮化为本体性的“抽象标签”。以叙事代认知,以感性替理性,心灵之娇惯造成他者之丧失。而若想要逆转这一“认知部落化”,个体需要一次中断:“你对此怎么看”(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须取代“事情就是这样”(Es ist so.)。

“事情就是这样”^[36]固执地否认事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解释,独断地将自己获得的关于事情的讯息作为唯一实情。而对于掌握了“真理”的我而言,不赞成我所理解的实情的你就是愚昧的他者。相应地,“我的真理”与“你的谬误”之间构成了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

与之相反,“你对此怎么看”是“一个有中断之潜能的问题,一个有潜能去唤起人们作为独特、特异个体进入存在的问题”^[37]。作为对“主体之主权的侵犯”,该问题迫使自我放弃一味指责他人肯定自己的本能自满与自负,进入与他者正常对话的交往空间。我不是形式地询问对方意见,而是在侧耳倾听的同时,感受与己同在的真实他者。这种致力于通过遭遇他者而打断“认知部落化”过程的教育,正是使部落成员走出部落边境的“越境学习”(越境的学习)。

(二)越境学习:对话场的营建

越境学习是通过对话更迭学习者经验的活动。从这一视角看,走出部落就意味着学习者借助与他者的对话,从而实现自身越境。越境服帖于他者,以最真诚的态度,呼唤他者对自我的回应。为此,越境学习强调通过真正的对话,防止因学习垂直化与对话形式化而造成的学习者的信息茧房化。

越境学习追求作为共创的对话。“对话”概念具有模糊性。从类型上看,对话包含4种,即探究、传达、应对与共创^[38]。探究是一方启发另一方探查真相的行为;传达是一方将讯息传递给另一方的行为;应对是一方就某一事件回答另一方的行为;共创是双方跳出各自的心理、认知与价值领域,分享信息并创造新知的行为。学习中所追求的公共人之间的对话,不是一方先知般地点化另一方的探究,也不是旨在降低误解率的水平讯息流动的传达,更不是发生问题之后必要的应对,而是以开放心态拥抱差异的共创。

然而作为共创的对话绝不是愉悦之事。有的研究者认为由于人本身是有好奇心的动物,所以新知识的获得与原有境界的毁弃是快乐的。仿佛只要一有机会打破境界,学习者就会心向往之,弃既有境界如敝屣。但事实是人虽拥有好奇心,却更贪图安稳。于以往实践中形成的既有境界,潜藏着至今为止始终有效的黠默前提^[39]。而越境则使这些早已深入骨髓的前提,再一次作为被检视的对象显现。于是迷茫、厌恶、后悔等情绪常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学习者只愿听取自己愿听的内容,而对显著的差异置若罔闻。因此,越境绝不容易实现。它的成功需要教育者的指导与其他学习者的鼓励。

这就突显出“越境学习”的第一个特征,即重视“以教师为主导”。所谓“以教师为主导”是指在学习者的越境学习过程中,教师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即从学习行为的诱发,到学习过程的推进,再到学习效果的评价,教师都居于把控全程的中心地位,正是教师强迫学习者进入与他者对话的空间。根据龟仓正彦对学习者的学习失败案例的研究,忘记“教师主导”才是导致学习者无法学习的首因^[40]。因为只有熟悉越境学习的教师才能培养出主动越境学习的学习者。学习者走出部落的越境力是被善于遭遇他者的教师训练出来的^[41]。

“越境学习”的第二个特征是强调“学习的社会性”。学习不是千篇一律的印刷,而是各不相同的互动;学习不是与冷冰冰的知识打交道,而是与活生生的他者相遭遇;学习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

是一群人的互帮互助。以开放的学习部落击败封闭的“认知部落化”,故而学习是社会性的。学习者在社会中学习,靠社会来学习,为社会而学习。是他者的憧憬引发了我的向往,是他者的情感触动了我的共鸣,是他者的智慧启迪了我的智识,是他者的风范激起了我的仿效,是他者的和善抚平了我的不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越境学习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憧憬他者之憧憬的关系性”^[42]。

“越境学习”最终归结为强调学习社会性的“相互学习”“对话学习”“水平学习”,而为了建立主体间的互动关系,首先就要建构“安心与安全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为了应对“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对话者暂时悬置直觉的“自动模式情感”(emotional automatic settings),开启理性的“手动模式推理”(manual-mode reasoning)^[43]。这就引出了“越境学习”的第三个特征,即提倡“对话场的建设”。学习者只有在特定的场域中,才能与他者一道相互学习。而所谓的场域其实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场域是物理与空间的场所;另一方面,场域是心理与关系的场合。

总之,想要走出部落,强调建构真实对话空间的越境学习是关键。正视对话双方非对称关系的越境学习,不满足于基于尊重的共存,而是致力于基于对话的共生。共生意味着自我的问题与他者的问题转变为我们正在共同面对的具体问题。

(三)微观视角:东工大的尝试

通过对话而达成学习者的越境,进而帮助其阻断“认知部落化”,东京工业大学的教育改革为此提供了微观视角。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力、对话力、越境力、共感力,东京工业大学于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在三岛良直校长的支持下,正式创设了将为本科生提供 3 年博雅教育(教养教育)的“博雅研究教育院”。作为一个以研究与推进博雅教育为目的的机构,教育院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它希望培养出“把握 21 世纪社会的时代课题,兼具认清自我机能的社会性、深入探究自我的人间性与行动·挑战·实现的创造性,建设更好未来社会的有志人才”^[44]。

在该教育院教授中野民夫看来,避免对话形式化的有效方法就是建导(ファシリテーション)。建导就是“使容易与促成”,它不是单一的一种方法,而是使活动与行为变得容易的一系列办法。具体而言,引入建导的对话课堂应如以下这般^[45]:

(1)在听完主讲嘉宾的讲演后,为了 4 天后的讨论,每一位学习者都必须按规定完成回顾笔记(ふりかえりノート)。回顾笔记是一张 B5 纸,其正面写着“概要:听到了什么(请在印象中保留下来的内容为中心归纳要点)”,其反面写着“反馈:听完讲演后,有什么想法与感受”。

(2)在正式开课之前,学习者将椅子围成一个大圆,以空出教室中间的空间。座位则没有安排,参与者可以自由就座。

(3)开始上课后,教师首先详细地介绍本课程的目的与流程、学习者的角色与上课时的规矩。随后参与者按逆时针顺序,简单地进行自我介绍(大致内容包括姓名、所属与喜好)。紧接着将全班 30 人分成 7 个家庭小组(ホームグループ),5 个 4 人组,2 个 5 人组,方便以后共同活动。

(4)如果是第一堂课,那在组成家庭小组后,学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组内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包括姓名、籍贯、高中、想要别人如何称呼你、喜欢的事物、擅长的事物、进入东京工业大学的第一印象、梦想等。

这个时候,原先 30 人的大圆圈已经拆分为 7 个小圆圈,并使用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促进对话工具”,即“圆桌君”(えんたくん)。这是一张直径 80 厘米瓦楞纸,桌上铺有同等大小的白纸与 8 种颜色的彩笔。学习者互相面向而坐,其膝盖上放置圆桌。作为一种与对话搭配使用的特殊教学工具,其指导理念是“语言不是空战,而是陆战”^[46],即让所说的话有迹可循、有案可查。学习者可以用自己喜欢的彩笔,一边记录在相互交谈中出现的关键词与自己的想法,一边与伙伴对话。这种看着便签与人交谈的方式,可以降低交流时的紧张感、加强说话时的逻辑性。而且交流结束后,它也可以成为归纳

总结交谈内容与思考观点之间关系的工具。思想过程的可见化(見える化)还有助于追溯上一小组的谈话内容。

(5)之后进入正式交流环节,即围绕回顾笔记的小组讨论活动。学习者首先逆时针浏览同伴的回顾笔记正面(概要),浏览完毕后,可以就小组成员的观点想法、关注方向、写作技巧、归纳方法、字数格式等进行提问。除此以外,进入自由对话时间的学习者,也可各自阐述自己的注意点。通过充分的交流,学习者可以发现彼此的不同之处。而对于因初次见面而紧张或不擅长对话的人而言,由于有事先写下的提示与随时随地可以记录与书写的“圆桌君”,对话也会变得相对容易。随着下课铃响,上半阶段结束。

(6)下半阶段开始后,每组留下一个主持人(ホスト),其他3人接着去别的小组交流。首先依然是按照范例,进行自我介绍,然后由主持人一边介绍上一组成员写在圆桌上信息,一边向新成员传达前一小组讨论的精髓。

(7)接着围绕回顾笔记的第二个问题(反馈)继续分享与交谈。整体上的流程与方法与上一阶段一致。

(8)在整个课程中,教师的工作只有3个,一是把控时间,二是说明项目,三是进行建导。具体而言,建导就是穿梭于各个讨论小组之间,进行最低限度的介入,以防止明显误解与脱离轨道的出现。

(9)最后,30人的小组重新围成一个圆圈,每个成员用一句话来总结陈词,并填写反馈表。反馈的内容包括今天的收获与发现、学习的情况与对课程的建议等。

有效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个人的沉思,还是集体的对话。以他者为透镜,照见自我之惯习;以交往为契机,组建学习之部落;以学习为媒介,悦纳他者之特异。以上的流程是“越境学习”“相互学习”“水平学习”在教学实践中的一次实验。当教师用以上方式开展旨在提升学生学习力、对话力、越境力、共感力的课堂教学时,他就是一位迫使学习者进入对话的“建导师”,而学习者就是不得不走出部落的“越境者”。而当学习者真诚地互相询问“你对此怎么看”时,存在论上的中断发生了,“认知部落化”过程被打断。

总之,在“部落时代”,教育遭遇了三重危机,即“因他者的丧失,而学习垂直化”“因为部落而战,而对话形式化”“因娇惯的心灵,而信息茧房化”。对这一时代性危机的克服需多学科的合作。但在当前部落的“自目的性”(autotelicity)大有并吞其“自反性”(reflexivity)的当下,教育学者的“反其道而行之”依然有其价值。在无法拒绝部落式生存的“部落时代”,唯以“学习部落”打败“认知部落”,他者才不会被部落吞噬殆尽,沦为“一个被论说的主题(topos),一组参照物,一个特征群”^[47]。

参考文献:

[1] MACKIEL A. Tribalism[M]//SHACKELFORD T K, WEEKES-SHACKELFORD V A. Encyclopedia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ical science.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1.

[2] PETERS M A. Education in a post-truth world[J].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7, 49(6): 563566.

[3] 坂本 旬. デジタル・シティズンシップの可能性と教育学の再考:「ポスト真実」世界のディストピアを超えて[J]. 教育学研究, 2021(2): 146157.

[4] 乔纳·森海特. 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M]. 舒明月, 胡晓旭,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93.

[5] 托尼·比彻, 保罗·特罗勒尔. 学术部落与学术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 唐跃勤, 蒲茂华, 陈洪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56.

[6] 马克·W. 莫菲特. 从部落到国家:人类社会的崛起、繁荣与衰落[M]. 陈友勋,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3.

[7] 田林楠. 从朝圣者到游牧民:流动时代的新部落主义:定位社交媒体的发生环境与接受背景[J]. 山东社会科学, 2018(5): 187192.

- [8]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92393.
- [9] 刘凯.部落化生存:新媒体对社会关系的影响[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64.
- [10] 张允,张梦心.“重新部落化”趋势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J].中国出版,2021(2):5458.
- [11] 王长征,周玲.面向“联系价值”的后现代部落营销[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2):5458.
- [12] 刘碧珍.“再部落化”与微信叙事[J].当代传播,2016(1):7477.
- [13] 师曾志,李堃,仁增卓玛.“重新部落化”:新媒介赋权下的数字乡村建设[J].新闻与写作,2019(9):511.
- [14] 魏晓冉,平章起.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社会学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2018(6):147153,189.
- [15] MAFFESOLI M. The time of the tribes;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M].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1996:72100.
- [16] SPENCER D C,WALBY K. Neotribalism,epistemic cultures,and the emotion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J]. Emotion,space and society,2013,7(1):5461.
- [17] 王斌. 体验式数字部落:“吃播”的群聚效应及其理论反思[J]. 中国青年研究,2019(8):9096.
- [18] 陈旭光,张明浩.论电影“想象力消费”的意义、功能及其实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5):93-98.
- [19] 杨劭,罗伯特·巴泽尔.斯蒂芬·平克:社交距离背后的部落主义[J].世界科学,2020(9):5556.
- [20] 卢克·拉斯特.人类学的邀请:认识自我和他者[M].王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74.
- [21] 香川秀太,青山征彦.越境する对话と学び[M].东京:新曜社,2015:20.
- [22] JAQUET,F. Speciesism and tribalism:embarrassing origins[J]. Philosophical studies,2022,179(3):933954.
- [23] 李有成.他者[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1.
- [24] 左高山.敌人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13117.
- [25] 约翰·哈特利,贾森·波茨.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7.
- [26] 约翰尼斯·费边.时间与他者:人类学如何制作其对象[M].马健雄,林珠云,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10.
- [27] 李彪.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J].新闻记者,2018(5):2834.
- [28]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9+292.
- [29] 西川纯. 学び合う教室[M]. 东京:东洋馆出版社,2000:25.
- [30] 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M].田雷,苏心,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6.
- [31] BOCIANA K,CICHOCA A,WOJCISZKE B. Moral tribalism:Moral judgments of actions supporting in group interests depend on collective narcissism[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21,93(2):413.
- [32] ASHOKKUMARA A,GALAIFB M,SWANN J W B. Tribalism can corrupt:Why people denounce or protect immoral group member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9,85(6):103874.
- [33] 徐贲.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61.
- [34] 让·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关于诸多极端现象的随笔[M].王晴,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142.
- [35] 金惠敏.消费他者: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图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5.
- [36] 韩炳哲.他者的消失[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6.
- [37] 格特·比斯塔.超越人本主义教育与他者共存[M].杨超,冯娜,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44.
- [38] 日本环境教育学会.事典:持続可能な社会と教育[M].东京:教育出版,2019:222.
- [39] 石山恒贵.越境の学习のメカニズム:実践共同体を往还しキャリア構築するナレッジ・ブローカーの実像[M].东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2018:12.
- [40] 亀仓正彦.失败事例から学ぶ大学でのアクティブラーニング[M].东京:东信堂,2016:137138.
- [41] VARBELOW S. Embracing the otherness of others:an approach for teacher educators to assuage social and political tribalism[M]//SHARMA S,LAZAR A M. Rethinking 21st century diversity in teacher preparation,k-12 education,and school policy:theory,research,and practice. Switzerland: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2019:5570.
- [42] 梅泽秋久.体育における「学び合い」の理論と実践[M].东京:大修馆书店,2016:48.
- [43] GREENE J. Moral tribes emotion,reason,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M].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13:

349.

[44] リベラルアーツ研究教育院. 私たちのヴィジョン[EB/OL]. [20220204]. https://educ.titech.ac.jp/ila/about_us.

[45] 中野民夫. 学び合う場のつくり方: 本当の学びへのファシリテーション[M]. 东京: 岩波书店, 2017: 511.

[46] 川嶋直, 中野民夫. えんたくん革命[M]. 东京: みくに出版, 2018: 62.

[47] 爱德华·W. 赛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236.

(编辑: 王茂建 校对: 刘大川)

Out of the Cocoon: Education Crisis in the Time of the Tribe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YU Jiaqi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ribes” do not mean groups composed of several clans with close blood ties, but communities in modern society that have common interests. The former are derivative of families, while the latter are the modern products. These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which differ from the traditional blood clans, also can be called “neo-tribes”. If the emergence of “nomads” who break away from the original order is the premise of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ribes, then the emerging media technology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and possible basis for retribalization. With the help of emerging electronic media,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at emphasizes the free assembly of individuals has officially come. The basic symptom in “the time of the tribes” is “the tribalization of cognition”, that is, the judgment that determines how people get knowledge about an event gradually changes from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truth of the event to individual sensibility and group memory. Reason and truth-seeking have given way to solipsism and conformity. Tribalism is a word that contains a variety of phenomena that relate to loyalty to and favoring of groups to which one belongs. “Fighting for the trib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ribalization, “the loss of the other” is the cause of tribalization, and “the spoiled mind” is the result of tribalization.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tribe, cross-border learning which emphas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 dialogue space is the key. The learning that facing the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dialogue, is not satisfied with coexistence based on respect, but committed to symbiosis based on dialogue. For that, “What you think about it?” has to replace “it being the case.”.

Key words: tribalism; the loss of the other; cross-border learning; a critique of modern education